

在表格形式中的行政法规和刑法典

[法] 魏丕信 (Pierre- Etienne Will) 著^① 张世明译

[摘要] 本文致力于 1730 年左右出现的将刑法典和处分则例的内容被编辑为复杂程度不同表格的特定类型的官方手册。其目的是便于掌握既增殖且不断更新的法律要领。第 I 部分描述了 I 系列的作品在十九世纪末修订和再版的历史谱系，顺便讨论了制表作者的行政专家背景、出版者的实践和针对的公众。第二部分更详细地论述表格表象的逻辑，易言之，概括和重组立法汇编文本使之“一目了然”所采用的各种方法。

[关键词] 律学 图表 大清律例 处分则例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8587 (2008) - 04- 0033- 20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the Penal Code Set in Table Form

This essay is devoted to a particular type of official handbooks that emerged around 1730, in which the contents of the Penal Code and of the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chufen) were set in tables of varying complexity. The aim was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a corpus of laws that was both proliferating and constantly updated. Part One proposes a history of the genre by describing a series of works some of which were revised and reprinted through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milieu of administrative specialists that produced the authors, the practices of the publishers, and the targeted public are discussed along the way. Part Two discusses in more detail the logic of table present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various methods employed to abstract and reorganize the text of the legislative compendia to make them “plain at first glance.”

以下页面是专门用在供帝国基层地方官吏之用出版的某一特定类型的实用指南中的信息制表^②。这些指南提供其读者以一个容易检索的各种类型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掌握对日常行使其职能、间接涉及其考成，以及由此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确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这些材料在数量和复杂性上还不停地随时间增长：我想要谈论的刑事和行政法规的文本源于在刑法典（Code pénal 大清律例）历经修订版本，其主要法（lois principales 律）和辅助法（lois additionnelles 例，有时不正确地被称为“先例”（précédents），以及由各部在“处分

则例”règlements sur les sanctions administratives）标题下不定期刊行的规定汇编。后者涉及了所谓的“吏治”，换言之，有秩序地进行由法规确立的的程序、遵守程限、地方官员的洁身自好和公正无偏，各司其职，以及属员责任攸关，等等。不过，大清律例和处分则例的刊布是大规模的和难以接近的，甚至从来就没有真正一天如此，因为一个版本到另一个版本，有关立法是不断丰富以新的文本颁布。
按诸其内容，这种制表出现于 18 世纪，而长久以来一直是刑事法和行政法的复合体：我现在没有遇到过 1734 年之前的样本。

[收稿日期] 2008- 2- 30
[作者简介] 魏丕信 (Pierre- Etienne Will 1944—)，男，法兰西学院教授；张世明 (1966—)，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然而，在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纪末期，作为一个系列的制表总结法典和规则的书籍出版，变得相当普遍，无论他们是新颖的创造、简单的更新抑或无耻的攘夺。这些书籍提出许多有趣的问题：就其形式而言，首先是如何设计的和这种浑然一体的表格如何发挥作用，但也包括其内容的确切性质，其集矢于那些公众，和他们作为一种编辑的历史。

—

这其实是我想要着手研究的历史类型：简短地说明在我的调查过程中遇到的书目，或多或少按照“学脉”加以重组，并考究其发展的时间顺序，我希望同时关注于书籍的内容的思想，看看他们由谁汇编和出版，更精确地界定他们针对的受众，并通过一些有趣的因素的收集研究中国出版历史。然后我将回到细节，从具体的事例看其形式的问题，亦即“表格”作为交际工具的性质。我们会看到怎样不同的格式可以想象，以此达到这样的效果：许多解决方案特别恰当地适合于内容陈述（繁复的规则）和目标（可让使用者轻松检阅）。

董公振、沈莘田和他们的遗产

据史载，第一部完全由表格组成的行政手册似乎时在 1734 年。我仅仅没有找到在此所提及以前的例子，但一个当时的作者确实提及在此讨论的这本书之前市场上存在《坊刻旧图三十余》。其中包括良好的 100 幅、作者一定为董公振的新著标题，清楚地表明所欲何为：《钱谷刑名便览》，2 卷。换言之，这是要为在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幕府中负责两个具有竞争力且至关重要的领域的技术顾问（“幕友”（les “amis de tente”）或法式英语中的汉学术语“私人秘书”（secrétaires privés）^③）提供方便检阅的信息：一则为税收，而事实上为整个经济管理，一则为法律和一切有关的司法行政之务。

乍看之下，应该指出的是，《钱谷刑名便览》可以译作“Matériaux faciles à consulter sur la fiscalité et la justice”。但钱谷和刑名是在大量手册的标题可以发现的字眼，这是明确用意所在。我所研究的所有类似的作品证实，以

《钱谷刑名便览》为原型的、通过表格形式的指南之目标受众，主要是幕友，即被官员聘请和为他们工作的专家。目的是要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工具，以便在进一步检阅更多有关的专门文献之前，快速找出其幕主所面对问题的法律和规章之资讯并提出解决办法。实际上，官员也被鼓励使用这样的指南，一般不会让他们的顾问垄断技术知识。这就是为什么序言作者除非不提这应该是为身处其职（官员）和那些在幕中工作（幕友）所需要阅读，他们也想强调一点，即：他们所谈论的著作要始终置诸官宪之“右”，或在其听讼时置诸于案……^④。但事实仍然是，汇编表格展现刑事和行政法律，像其他类型也涵盖钱粮和刑名的领域的手册一样，不仅仅完全是技术顾问的绘撰^⑤，但也主要针对他们的。

与大部分其后继者相比，董公振的著作是相对较短的：第一卷，其中涉及税收和财政的问题（钱谷领域），有 45 个表格组成，在第二卷，有 52 幅表格，专门针对司法领域。但其对后世极为重要。此外，我们发现在第一版之后的年份里版本增加了^⑥，钱谷刑名便览的确是造成了一系列类似书籍，明显受其启发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继续出版，其历史不仅非常充分说明了类型本身的发展，而且还说明了其所回应的不断增加的需求。

在这一系列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名法指掌》，此一名称为沈莘田的专门法律问题技术顾问汇编，我们知道，其首版刊刻于 1740 年，今天似乎已佚亡。不幸的是：同年正是大清律例（Code pénal des Qing）的一个全面修订之年，第一次“例”被纳入“律”，具有辅律的地位^⑦。沈莘田 1734 年就已开始大清律摘辑并置于《名法指掌》容易检索之“图”（指掌，老法文“comme qui l'aurait en paume”的意味与前述标题中的指掌是大致相同的）。这个不幸的巧合解释了修订颁布和自 1743 年在《名法指掌增订》标题下本书扩展的问题。是年夏，沈莘田得以详细研究 1740 年大清律例的有关新版本^⑧。

《名法指掌》的出版历史是人们可以由序言和凡例加以重建的，是在几个方面具有启发性的。首先，是刚才提到问题，我们发现，这

种类型的大多数书籍是不断变化的规章和定例的汇要（Corpus）^⑨：如果他们想要成为实用的概括，必须定期修订。在政府发表了一部新版本的法典或处分则例时，这是尤为必要的。在刊刻于 1743 年的《名法指掌》修订版中，沈莘田在一笺注中说，颁行于 1740 年的大清律例更定此前镌刻内容^⑩达到 30 - 40%，是故其被迫完全重刻其著作和添加 50 幅表格（使总数达到 255 幅）。并证明它确实是一个新版本，而决非一个轻微的修正版本，但不正当的贩售往往是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修订版”（换言之即前述在封面页所题作的“新刻”或“新镌”），沈莘田明确表示，印刷版的旧版的刻板现在可以付之铲削和指派另用。

不过，（在理论上每五年）颁布新版本的刑法典或各部则例汇编，只是在总结在对官僚开放、中央政府内部流通的京报（Gazette de Pékin）刊登的或多或少经常一个持续的过程创造立法，并考虑到合乎时宜。诸如《钱谷刑名便览》《名法指掌》和其他类似的书籍，在这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视具体情况加以整合。或不断的刻本彼此交互补充丰富，或更正直接在印板上进行，或甚至不论这些更新（有时以印在书名页的戳记，注明收入直到某一日期的新规例），读者被邀请在他所拥有的之书使用由出版商预留的空地或空白页抄写自刊印以来生效的条文^⑪。

《名法指掌》的出版也显示了刑法在管理知识的武库中的重要性、技术顾问被首先预期谙熟的知识和他们有权主张高工资的理由。沈莘田在 1740 年在他的前言解释说，从 1734 年进行的总结刑法典制造表格有这样的动机，就是有必要以更加完整详尽者取代是年出版的董公振《钱谷刑名便览》的法律章节。在事实上，《钱谷刑名便览》的“刑名”诸篇章的内容，大部分是官员在失当的司法行政案件中所招致的处分以及其对他们考成^⑫的影响。而在沈莘田看来——至少他是这样说的——国家法律领域的刑名（写作“dénominations pénales”，但还被称为“罪名”）问题首先关乎人命，亦涉及到复杂得多的一套法规和行政任务。

事实上，沈莘田的贡献在于以董公振所发明的表格系统介绍刑法，实现了结合刑名的图

表展示——这其实是分类原则占主导地位，自此表格大部分涵盖了刑法典、增律所列的犯罪类型和可以归诸于官员的舛误所适用的行政处分。这本书的一个修订本编撰者如是写道：“沈氏著书专为定罪而设名法。有简处分者，附见各图。”共处有时是模糊的，在这两方面（刑法的刑事法和行政法的处分则例，这涉及的远不止仅仅司法行政的职能）的特点并不总是很容易区分，在这篇文章大部分的文献都有这个问题。用同一作者的话来说，一些书籍“别载处分与刑名为两事”，而事实上，“处分亦法令也”^⑬。另一作者石中隐，我们有其总结的一套重要的《处分则例》表格（我在后面将会介绍），他指出，大量的资料不掲載于刑法典，这两套规则是以互为“表里”关系相辅相成。无论如何，不少出版物设法統合这两个开创者——沈莘田（更专注于地方政府的司法方面）和其前的董公振（考虑到更广泛的活动，而关注于官员行动对他们自己生涯的后果）在流派上的努力。正如我们刚才所见，《名法指掌》已经包含一些处分则例的法规在表格中。五幅表在本书第一部分（在开始刑法典本身的制表的很长的关于人命一节前），其实完全是致力于纯粹的行政纪律：“限期”。此乃从下至上各有关当局科层进行勘验和审断所须遵循者，一旦逾限就会制裁开始降临。限期一节被置于是书所有后续版本的之首，在篇幅和准确性上继续发展。

除了它的两卷，1743 年出版的《名法指掌》修订版本包括了一本题为《名法指掌增订上卷便览》的补编，专门关于行政制裁，这是董公振《钱谷刑名便览》稍微修改了“钱谷”一节的一个版本（72 幅补表虽然有些集中在其他方面的行政管理，大部分实际上是关注税务和财政）。沈莘田还顺便在一个注释中解释了其借鉴的原因：在他于 1743 年结撰其著作修订版本时，他为幕于广西按察使，因为董公振的书在边境省份很难找到，准备刊行是书的书坊曾建议在附录中吸纳董书的材料。在属于其一位同事手稿抄本的基础上，他确实如此做了，并适应自己的格式^⑭。顺便一提，这一细节向我们表明，即使是书肆经营在帝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偏远地区都知道在其他市

场可利用的有趣的著作，并可能在本地发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手抄本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图书馆还有很多这样的抄本，往往对考证其印刷版助益良多。

无论如何，大约同一时间，即 1744 年，一本以以上两位作者之名联署的题为《增订刑钱指掌》的书，4 卷，似乎并未在偏远的广西省，而是在北京刊行于世。前两卷实际上复制的是沈莘田的《名法指掌》（显然是可以追溯到 1740 年首版，有一些修订），最后两卷则是董公振《钱谷刑名便览》的“钱谷”这一部分^⑤。与前面提到的书籍不同，这本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业出版物。它来自琉璃厂的出版商之一——荣锦堂，其从来没有被保证的市场，遂意这样的方式做他们的广告：以《仕宦要览》的字样覆盖《增订刑钱指掌》以此作为同类著作的另一个。同一本书一个多世纪后未经任何修改由另一家琉璃厂书肆文宝堂在 1856 年和 1868 年再次重印为袖珍版，是相当了不起的！

我们发现不少经常在书籍标题页提到的其他“堂”的地位，并不总是很明确：这是商业性的书商，还是可能是受官员或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资助以公诸“同仁”或“同志”？这种区别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1743 年在广西出版《名法指掌增订》的同德堂，是像其他许多慈善意味的名称，但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这还是市场意义上的书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本书已之出版需感谢沈莘田的幕主、省按察使、序言作者李锡秦的鼓励和财政援助。事实上，一些官员、有时甚至非常高的职级的官员，为了使面向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对管理问题有相同的热情的顾问所编纂的工具书可能出版，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写的序言赞美之词，当然被用作卖点。《名法指掌》首版的刊行，无疑需要感谢广西广南府知府陈克复的慷慨，其丁忧回籍数年后任云南省按察使将沈莘田聘入其幕府之中。这我们仍然是见于其序文。正是他的捐钱使该书可能被刊刻，最终沈和他的兄弟在他们家乡婺城（即，浙江湖州）加以扩充（他们添加另外 30 幅表）。我们刚才看到的 1743 年修订版本的面世应归功于沈莘田的另一个幕主李锡秦。

我们刚所提到的高官、幕友和书肆之间的利益结合，在文本历史的第二个阶段更为突出。奇怪的是，第二个阶段与第一个阶段之间被几乎八十年的时间段所隔离开来。董公振和沈莘田的书籍似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我们会在事实上看到他们满足了实际的需要。沈莘田 1740 年在序言中曾经指出，其同事董公振的《钱谷刑名便览》“久已风行海内”；其自身的《名法指掌》第一版（即 1740 年版），据他 1743 年解释再版理由云，“好事案头多置一帙”^⑥。这两部著作相继刊刻，每一次均把最新的法规纳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似乎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促使与两位作者分别活动的江南和西南地区相隔迢迢的琉璃厂书肆在 1744 年印行一种合刊。但我目前未发现在图书馆这两本书在 1745 年后^⑦再版或新刻，其实直到 1824 年就没有再版是可以相信的，因为题为《名法指掌新例增订》（是时 4 卷）1824 年新版本的编者纽大炜云，文本“八十余年”仍然如故，这解释了他不得不进行相当大修改的原因。关于犯罪和刑罚“多数”条款必须辅之以其他规定，或删除，或修改，这本书现在包括 360 幅表格而不是 1743 年校订本 325 幅（包括从董公振书中借用过来的 70 幅附表）；在卷 4 加上两个附录分别专门讨论“六赃”（21 表）和各项处分（53 表）。因此，虽然仍是同一本书、同一序文、同一后跋、同样的表现方式、同样的书名，但其被大幅扩充并更新^⑧。其新颖的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省例”（provincialisée），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特定的凡例，有关广东省的规章和成例已被考虑进去，而编撰者忽略了那些有关京师或其他省份却不在广东省范围的规章。这种省份的专业化在由幕友为自己同事编纂的其他手册中不乏其例。但不同于董公振和沈莘田，纽大炜不是一个幕友，而是候补官员。这种官员在 19 世纪特别多，在各省会等候任命，同时担任代表省当局的差委（委员），有时很长的时间，以在审判工作中被历练^⑨。但纽大炜的上司不是别人，正是阮元（1764–1849 年），十九世纪初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时任两广总督，因此他指示准备更新和扩充沈莘田的著作。这个敦促用户自身

补充新颁行规章的新版本，是在广东印制和出售的^④。除了这个 1824 年版之外，这本书有一个日期为 1860 年的新刊本，尽管号称“增订”，但完全一样^⑤。

纽大炜的这一新的修订版绝非道光初年唯一的刊行。当时，在四川于 1830 年也有刻板，有些不同，但也是四卷，题为《名法指掌新纂》其编者是一个叫做黄鲁溪的人^⑥。他也是候补知县，但为了改易沈莘田和董公振旧作，他由一个名为邵绳清的幕友协助，而邵在 1828—1829 年黄署任小溪（四川）知县期间为其幕友一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使邵绳清成为主要著者^⑦。一旦黄鲁溪返回成都恢复了候补的地位，所完成的工作在此时是在 8 名校勘人员帮助下进行，所以这是在 1830 年发表的，我们不知道书肆是哪一家，但其肯定得到了该省最高当局的眷顾，因为我们发现，除了黄鲁溪本身的序言外，还有总督（无疑是琦善，他是皇帝的堂弟，其著名的外交顿挫仍然是后来之事）^⑧、布政使、按察使和盐茶使司的序言！（所有这些序跋的日期均为 1830 年）这些高级人物似乎并没有像阮元数年前指示纽大炜更新《名法指掌》一样对黄曾经明确指示：黄自己的序言中，这项工作作为是一种有益于幕友和同僚的业余爱好，当他代理知县时，他的这一爱好无瑕顾及，他则将其见示于他在成都的同事（和他一样的候补官员，我们可以假设）；他们不仅帮助校正其手稿，且对其印行亦慷慨解囊。简言之，虽然该著作最终得到了著名序言的锦上添花，初则是一个行政管理活动家热心于将此工作法宝以公同好。

如前所述，纽大炜在 1820 年或 1830 年更新沈莘田令人钦佩但已过期著作就需要大量的加工。据黄鲁溪序言称，自沈莘田最后版本八十年来，60—70% 的成例已被修改，1740 年以来 20% 或 30% 的表格过时。黄鲁溪的这次修订据称更新直到 1829 年这一时点的内容，包括 100 幅表格，少于纽大炜，但它是以同样方式制作的。事实上，一个前言迂回地指出，纽大炜的修订堪称典范：言简意赅、内容精审、介绍明晰，表格较少。事实证明，在读者的观念上，所有这些版本被或多或少混同于我们所见《名法指掌新纂》标明时间为 1832 年

的一个所谓的“新版本”（刻版是藏贮于勉行堂，但不知位于何处），具有同样颇负盛名的序言，但文本本身只不过是纽大炜的修订本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复制，甚至最小的细节露白中央所刻的标题（即《名法指掌新例增订》）亦了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删除了在凡例后面纽大炜的落款，以便有效地被视为一个编者！因此，它涉嫌盗版，不过行事甚为谨慎，如若不然，则会被出版商指控为翻刻，将受到严厉起诉。

如前所述，黄鲁溪曾顺便提到《名法指掌新纂》手稿在 1828—1829 年间获得其幕友邵绳清的帮助。但 6 年后，即 1836 年，似乎是表格源于董公振和沈莘田所编纂的一个新版本问世，此时题作《读法图存》其编者正是邵绳清。是书序言是由于名为梁士俊者所撰，介绍自己作为一个幕友是邵的一位同事，而还言之凿凿云其在过去 30 年专务此业。在参与黄鲁溪所刊修订本之后，邵绳清担任名为李馥堂者的幕友，后者作为候补护理四川提刑按察使司符篆一段时间。在此四川汇宗刑名诉讼首要枢纽之地供事期间，邵有机会去分析了一大批案件。这本《读法图存》即是其所有经验的结晶。

这在当时似乎是董和沈的表格最详细的修订。不惟大量的辅律和法规被纳入增加，而且有 24 门而非在《名法指掌新纂》中的 19 门，表 356 幅（而不是 257 幅），表的分配也时有变化（每个修订本也是如此）；贪污和挪用公款（六赃）门大为扩充，最后一卷包括新的一套刑法典总则（第一部分的标题为“名例”，在与与六个广泛的行政管理领域相对应的六部分之前）和关于秋审的表格。和在署名黄鲁溪的修订本等中一样，在书眉也有参见提及可比照情况的表的注释。这一处理旨在克服刑法典条文对用户所提出的主要困难之一，即可援引的准照条款的分散。

非常有趣的是，邵绳清的修订本并没有庇护于高级人物之下，与他也躬与其事的黄鲁溪所刊修订本不同。出版者、即刻版拥有者正是邵在虞山的家族（虞山邵氏藏板），不仅给出了地址，而且阐述了所费工本（包括劳力和材料），其售价为 4 两白银，是比较高的。尤

其每部书均打上了序号（这个细节表明了在中国的中文刊行中非同寻常的弥足珍贵）：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得以见到的是第 189 号。

这本书有标明时间为 1860 年“修订版”，在任何一点都类似于 1836 年版，包括地址和价格的标明。如前所述，纽大伟十九世纪在广州第一次修订本亦同样重印在 1860 年，仅包括一些小增补^⑤。不过，董公振和沈莘田在雍正年间设计的巧妙表格的历史并不停留于此。是书题为《名法指掌图》的最终成形，标明时间为 1870 年，此次出版完全是官方的。

编纂者徐灏是一个知府，正如他在序言中云，他接奉广西巡抚苏凤文指示，延伸更新始于纽大伟和黄鲁溪版本。（他顺便回忆说，1743 年《名法指掌增订》的原始版本已经广西编纂）除了有总督和两名巡抚的序言外，这本书是“同治中兴”（restoration Tongzhi）期间位于几个省会城市半官方的书局印刷和发行的，受到法曹有司的积极鼓励^⑥。位于武昌的湖北崇文书局是其中最大和最活跃者之一。事实上，湖广总督已由其同事从广西送来而得到手稿副本，决定在辖区出版此书。总之，一百三十年前由低微的幕友所设计针对其同事本身的一种指南手册（how-to book）最后版本，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变成了由帝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推动的政治-行政管理重建计划的要素，其编辑和序言清楚地揭示了这些情况。

徐灏监督进行的更新似乎相当可观：将直到 1869 年前颁行的则例和条例补充进去，删除不合时宜的法规，重新制作一些表格，创设了新的门类，并重组了原书的一部分。首先，它证实了表格编辑的活力和人气，此乃使对地方官员复杂但关键的事务具有可接近性的技术^⑦。我们将看到——在我们采取逻辑审视之前——不仅仅沈莘田和其后继者使用这种技术。

其他书籍

正如我所指出的，沈莘田和董公振所创造表格的修订在编纂历史上存在奇怪的断层：80 年期间，它似乎没有修订过（虽然依其界定，内容被声称定期予以修订），但这要追问的是，为何这种旧的模式在道光初年被各个作者

所呼应而同时出版了其他书籍。我不能保证我曾寓目在 18-19 世纪出版的所有刑法和行政制表，或更准确地说，所有这些仍然存在的图书馆，不过我相信其中主要的均已为我所知悉，因此可以发现下述的资料涵盖了大部分领域。我怀疑这种类型著作的书目多不胜数，否则就不是被重印（和翻刻），因为大量表格汇编、制表及刻版有时极为复杂，材料的整合本身就很复杂，只有造诣精深的专家可以驾驭，堪称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的注挹。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表述成功后只是为了适应续期立法或在细节加以改善，甚至几十年沿袭不变地重刊。不能否认的是，有时对手的出版物对他人著作加以批评，似乎竞争的确是激烈的，但只限于有限数量的出版物之间。

就我到目前为止提到书籍而言，主要的作者类型是从事专业技术顾问，他们有时不仅是专业人士，而且也是许多文学作品在高官大吏内部备受推崇的作者，这种往往与高官有联系的一种专业共济和相互激赏体现在这些著作的序言。其中两个值得一提的应首推万维翰和王又槐。如此情形不乏其例，即：学者们将其抱负局限于技术顾问生涯，基于收集在他们书籍前言散见各处的信息，我们对他们的履历和所居职位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确切生卒年月。（不过，万维翰告诉我们他已年届七旬，题跋所署时间为 1770 年），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在这一案例中万维翰在直隶、浙江担任幕友，历时乾隆初期和中期（1736-1795 年），而王又槐的大多数著作也出版于乾隆末年（亦即 18 世纪），即“二三十年”担任刑名幕友职业生涯后^⑧。

万维翰与竞争

万维翰《律例图说》10 卷，经历了多次重印（我目前确认的有 10 次），显然涵盖作者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从序言明显可见首版日期为 1750 年，而我知道^⑨最后版本还整合了 1784 年颁行的新法律文本。所有这些版本来自同一个地方，即万维翰家族所在吴江（江苏）的芸晖堂。显而易见的是，这也是非常商业化的出版刊物，标题页之上载有“翻刻必究”，我所见过的几本盖有印章，显示该刊本已考虑到此前最新成例加以更新的截止日

期。(更新通常附加到每一门末尾表格中,有时插入补充页。^⑩)似乎实质上有连续三个刻本:约1750年、约1763年和1774年,每个版本都加以系统的修订,但这不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部分更新的再版。

这本书其实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它即使是也是刑法典和处分则例的表格的再现,但远不止只如此(因此,正如在首版序言中称,“汇两书为一编”)^⑪。我毋宁愿称之为一种行政制表的百科全书(在首版460多幅表),尊重法典的一般次序(这也是按照政府传统的六部)但没有避免一些出入以使之更合乎逻辑^⑫,有效地整合刑法典中的律例以及处分则例(后者尤其是在吏、户诸多门类),然后刑法典的条款占据在第4卷“刑”之一门,但对此加以整饬排比,我不禁称其为“规则的积极呈现”(présentation positive de la réglementation):事务是如何组织和不能不做的,而不只是如果违反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则将承担什么责任。许多表都开始阐述规则,或甚至提供定义,颇类似在会典中官方编纂的类型,其次才是(在表的下部分)错误或疏忽的详细罚则,有些甚至包含没有制裁的特征。

这个行政管理大百科全书另一个特色来自其表述本身(即来源于表格的形式),当然是其简洁,没有任何个人评论的主张或任何发挥,亦无辅助法和则例来源和日期的说明。但基本资料确切,最尽可能中立和客观地表述(可以说是不能压缩的^⑬),编排紧凑,以一个合乎逻辑的方式在表格中尽量逻辑地安排,并在任何情况下易于翻检,无论是检视查阅卷目录索引的详细内容还是查找使每一个问题很容易浏览在版口的标题。很明显,如此丰富的信息、具有可读性安排,对没有经验的州县官在日常工作中是一种宝贵的帮助。这对今天的历史学家亦是相同的,这些历史学家比清朝时候的官僚尤甚,被快速淹没在《会典事例》处分则例和刑法典的细节和错综复杂性之中难以自拔。《律例图说》可谓很好的现代版!

在结束对万维翰的论述前,我想补充一点,即:在不同版本中,我们发现一个题为《律例图说辨讹》的文本,这似乎是出现在1762年或1763年。所谓的错误(“讹”)列于

这本书结尾的清单中,同时他们还不是万维翰(这不是一个勘误表)而是鲁纬天的著作中的讹误,鲁是来自浙西的另一个刑名幕友,氏著明显为竞争对手,甚至在其标题:《律例图说掌珍》。我颇为犹豫,但还是翻译为“vo tre Liili tushuo préfére”^⑭。

我所见到^⑮的这本书唯一样本是1761年的一个版本,可能是在标题下首次出版:这表明万维翰次年已经进行回应,这从其《辨讹》序跋日期可以看出,1763年《律例图说》的一个新版本自序尤其彰彰甚明。其严正指责剽窃自己著作的竞争者:“近见坊刻贸然剽取百余图,列入掌珍旧本,亦号律例图说,以为射利之计”。事实上,1761年版《律例图说掌珍》的这两个标注时间为1760年的序言,都是题为“刑钱掌珍序”,关注于“掌珍旧本”。不过,万维翰说,这样做是为了掩人耳目,因为成例变化和其竞争对手剽窃表格先前的成例,而他在其新版本中已经删除了所有过时的法规,并考虑到了最近的颁行;《律例图说》的版本所加上的“辨讹”清单一目了然:20处含有错误,这很清楚只是一个举隅而已^⑯。

无论如何指责,结果表明,该1761年版的《律例图说掌珍》被称为忍济堂者所刊,凡例署名忍济主人,似乎正是编者鲁纬天(这可以从连同署名的戳记看出)。换言之,后者乃是对“受害人”万维翰一种克隆^⑰,万氏系编制了类似图书并同样在家族“堂”的戳记下出版的幕友。我们当然有必要由此窥视商业竞争,或多或少予以宽容和对所涉及的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公平衡量,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毕竟是一个很小的世界、一个由地位迥异的专家和行政管理活动家(这是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官僚精英”(élite bureaucratique))组成的环境,其中人员的交流如同资料和文本的交流一样,其成员都知道各自的工作,当然更不用提在各省和北京的书商伺机以待有可能风行的版本。大部分的有关人员的关系对我们讳莫如深,但有些仍然会在序言迂回出现,或从各种迹象可以想见。举例来说,不能不注意到的是,同一个李锡秦,我们看到他在1743年时是广西省按察使,已资助出版了《名法指掌增订》也出现在1750年万维翰《律例

图说》首版序言（实际上万维翰是其母亲一边的一个堂弟）。他此时是广西省布政使，即使这次他似乎没有在财政上的贡献，据悉他至少对小表弟将所示《律例图说》手稿“付之梓行”勉励有加。

在万维翰与其序言抨击冒牌货之间争议的最大论据在于需要不断追踪最新颁布律例：由此，这些版本被更新，或那些版本完全改写另一种，或者至少是那些用户可以将这本书印刷后的成例复制到你拥有的刻本上。而对那些希冀轻松赚钱的盗版者而言，他们并不严肃考虑这个问题，仅仅是复制旧表而已。不过，鲁纬天当然是知道需要提供更新，并在《律例图说掌珍》每个表后面预留的即行生效律例一张空白页。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看到的样本在这些空白页就有一些手写的增补，而且是仔细地以红色标示，显示这种“不完美的盗版”有积极的使用者！我们也将进一步从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同样的表格在鲁纬天书中甚至较诸在万维翰书中呈现得更好。这表明，如果就是有抄袭、剽窃，也至少是有智慧的抄袭。

石中隐和王又槐

我们将出版历史的讨论结束于另一本将规定转换为表格的著作，是书专门致力于行政处分，这是由于其最新则例的确很少人能掌握奥妙、不断的变化和矛盾所致。我们也发现这样不幸的巧合，似乎当，一本书基于旧版本的刑法典或处分则例出版后一个新版本的刑法典或处分则例就接踵而至。这发生在石中隐 1776 年编纂的《则例图要》，仅仅一年后颁行官方处分则例的新版本，然后订正和扩大数次以反映这个新版本和所有嗣后颁行的则例。这本书的一种新刻版是 1790 年在杭州以《则例图要便览》（49 卷）的标题出版的，并于 1792 年再版，此次是以《则例图要便览增订》的标题^①。该版本的修订人是王又槐，他是著有许多书籍的幕友，在地方官中声名卓著，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其 1792 年序言中，王又槐解释说，在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幕生涯中，从来没有离开过石中隐编纂的著作，这已经很好说明了的幕友对于其雇主所起的“第二自我”（“d'alter ego”）的作用^②，处分

则例的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实乃朝廷命官，而非其幕友，后者没有居官任职。但幕友负责为他们的老板通常经他们建议而作出之决定提供法律后果，因此，虽然诸如《则例图要》等书明确针对初涉仕途的官员，但他们其实针对的是官员每天日使用的顾问，即便王又槐尚且如此，初学者则更不待言。

不管在这里王又槐与其一位名为陈敬修同志合作所作修订与重组工作的细节（也是有限度的），他说，在石中隐著作中，脱漏的材料仍然是存在的。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正是为何市场上似乎已经在十八世纪末叶产生了这样著作的原因所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万维翰宏伟的编纂直到 18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仍被更新和刊刷（也许其在嗣后还在继续，但我现在没有看到）。就王又槐本身而言，他在 1790 年初竭尽全力以出版处分则例非常庞大和详细的改进制表版本，即刚才讨论的《则例图要》。无疑，该书传播得益于其声望。最后，我想引用在这里的第三个例子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刑法典制表。这次是纯粹的“刑法典”，而不是与行政法规和纪律处分的成例联系在一起介绍，在《律表》的标题下出版，其中第一版标注时间为 1778 年左右，有修订并考虑到直到 1788 年制定的成例的版本^③。

律表

和《则例图要便览》一样，《律表》是一部颇具“份量”的著作：共有 38 卷（再加一首卷）^④，各卷相对较短，但该版本却共有五个或七个小册子相继其后，此外还有补充小册子，提供了著名的《洗冤录》1694 年官方校勘本制表^⑤。所有律和例依照大清律例原文秩序被纳入，一般概念（服制、八字、六赃等）亦然。比较重要的疏议在必要时以注释形式插入于天头空白处。

《律表》作者曾恒德不是一个幕友，而是隶属具有在“律学”掌握堪与幕友媲美的真正专家的帝国政府唯一部门（刑部）的官员。这些专家往往有比较大一部分自己的仕宦生涯在刑部，其中曾恒德已经官至郎中，而他曾担任律例馆纂修官^⑥。因此可以想见，他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在其凡例中说，他本身用了八年的劳动制订并编排表格形式。

我们只有显示该书编纂的成功和对其要求回应得间接迹象，但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首先，这本书直到 1880 年（因此超过一个多世纪）有再版的事实。我们又得知，当曾恒德被任命为知府时，他离开刑部，随身带上了印板。虽然如此，需求（即在北京的需求）鼓励他的一位同事产生一个修订的新版本。我们是通过一个名为曹沂者给这个新版本注明时间为 1791 年的序言知道这些细节的。曾恒德离开京师的日期无法断定，但曹沂本是刑部的一名前任官员，声称新刻板系其父亲肇端和由其本人完成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曹沂的刻板就是“袖珍版”，虽然它很可能就是，但无论如何，仅仅存在这样的开本大大缩小的版本，其中几乎均系出版商所产生的廉价出版物，此乃版本成功和所需要满足的需求再清楚不过的表征。

二

这一要求是相当容易识别的，它决定了这里所讨论的出版物的形式。我已经提到：作者汇集律例而编成表格首先针对的是所有初登仕版者。这些官员尚未了解仕宦生涯复杂性及危险性，应由被提供学习工具，使他们能够尽快熟悉公务，以避免在仕宦生涯可能出现的失误和事故。这不外乎是官箴书一个相当普遍主题：居官很难和充满陷阱，没有有经验的人（如幕友）协助，首先没有一个牢靠的襄文案者，将举步维艰。许多作者在手册前言或其他地方抱怨经验不足的“书生”通过科举考试便骤然擢拔至负责岗位，帖括之学完全无济于一名地方官员的具体任务，在听讼中面对当事各方的叫嚣的和皂役书吏的来来往往甚至恐慌得手足无措，动辄甘心地向书吏来告诉他怎样做^④。同样遗憾的是，在倾向于株守经书的儒生中蔑视技术，如金融、军事、农业，特别是法律。而“读律”相反应该未来的官员首先关注所在。我刚才提及的考虑是在部分关于法律和司法程序书籍作者或作序者的确特别普遍，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表格的汇编大多篇幅是用于刑法典和处分则例。

但它不只是针对初学者。很明显，大部分

的表格汇编的第一部分提到，这项尝试的目的不但在于提供给这些年轻而没有经验的人外，还旨在帮助关注效率的有经验的地方官。为了相同的目的，将法典改编为简单易学的歌诀，内容比表格大为简单^⑤。表格不只能用来学习律例，也是地方官员日常工作中的工具，因为，除非他们是在次领域真正的学者（有这样的人）^⑥，有可能迷失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的规章之中而难辨津梁。

刑法典（姑且不论处分则例）是非常复杂的，检视是很困难的，并且这不只是针对初学者而言。在 1830 年出版的董公振和沈莘田表格修订本序言中，黄鲁溪说，当他将手稿见示于在成都的 8 位同事准备好校对和捐助出版时，这些贤能之士尽管皆善读书究心刑名之学者，但还是表示了刑法典的如下困难，从而凸现了其手稿的价值：

以为律例| 书，篇帙浩繁，读者每有望洋之叹，而其间缕析条分，| 事而情罪各异，非精审于几微疑似之间，则毫厘之差，谬以千里。今得是书而纵横求之瞭如指掌，随事印证| 目了然，诚服官者之宝鉴也。

以徐灏来说，该知府监修了这本书为人所知的最后版本，他在序言中（1869 年）说，只是接触到了沈莘田所发明的表格之后才开始了解一些刑法典的端绪，或更确切地说是其结构：

余少而读律，老而不能详，得先生之书，然后稍明其绪，益信古人左右图史以相辅而行也。

我不久便会回到“古人”左图右史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强调黄鲁溪和许多其他作者使用如“一目了然”、“瞭如观火”等等成语所表达的清晰和直截了当的理念。并且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修辞学上的格套之词。正如《名法指掌》凡例所指出的那样，布局就已筹划达到“一望了然”的目的：它力图尽可能地以每个表在半页之内（即一个对开正面或反面），但此内容至为繁复，便不是平铺于整个对开表面（正面和反面），易言之，不是被置于同一板印刷，而是以前页阴面后页阳面共为一图，标

目上格。因此，这不是《律例图说》目前的状态，人们在那里必须翻开新的一页去读与该图相随附的在背面的解释。

关于视觉上一目了然同样的关注，个别一些序跋提到的一部文献是很难置而不论的，我认为其已经亡佚，但截至发稿时，我发现了收藏于东京大学大木文库的一个样本。它是一套两个表组成的印刷展开卷轴，55.5厘米宽，一目了然，并且资料之详细十分壮观，125厘米高，大部分系刑法中两个最大门类——刑、户，加上了若干一般性资料。整个题作《名刑图说》我们从其他来源获悉，其发明者是一个道台，名叫铁珊，其他则无从考证。我们也知道，这些表格被诸书用来作为资料渊薮，流传甚广，胡陶轩《续辑名刑图说》（序言，1881年）以一个连续的表格（水平的）非常明瞭地概述了刑法典和有关司法行政处分，即以53个双页面的形式附于一本小册子。

无论如何，这不仅是必须清楚的，而且也是不用浪费时间就可查找到的。为什么呢？官箴书也对地方官提供了大量的文本和序言，强调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但没有决策失误。在头脑发热的听讼中，风险永远是巨大的。在公务纷至沓来和原告喊冤之际^⑦，很可能做出草率的判断将被败诉一方上控或被上级法院以形式瑕疵或缺乏论据驳回（这是被有系统地审转，涉及死刑的犯罪直到京师刑部，因为它不仅是我们称之为“民事”的纠纷）。此外，任何错判和程序违反当然都会受到行政处分。

不过，速度不仅是一种强制约束，亦是一种美德。正如许多手册的作者（其中有些人似乎已是真正的公堂听讼高手）所揭示的那样，沓泄从事在一宗案件中只能导致问题：供录文案丢失，勘验的伤势或死亡尸体状况恶化，两造和证人幡然变计或从事各种交易谈判，衙门吏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干预和在诉讼人背后牟利自肥，等等。简而言之，速度也需要某些预防措施，其中首先是对所采取决定的法律依据绝对具有确见。这些工作工具就是服务于可以使复杂的刑法典和成例的主题“一目了然”，将在司法援引层面极为复杂的进一步研究留待端绪明瞭之后。^⑧

“图”和“表”

这些著作声称“瞭如指掌”，因此采取“表格”的形式。这究竟该作何解？如前所提及，我所准备更准确地描述的只有确非常广袤的语义场的一小部分。“图”这个词意味着数据图表（figure）、地图、示意图（diagramme）^⑨、资料的表格（正如目前这种情况），或者甚至完全是一个名单^⑩。几乎所有的著作在开篇就提到标题的“图”这个词；如若不然，在这些书的目录中，这些表格被称为图，再或者，在这些表格上方的题目里含有这一字眼。

有一个例外是：我所描述的最后一本书——《律表》。图和表两者是有区别的吗？所讨论的书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的表格是完全一样的方式，但这些图书均使用“图”这个词。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应该追问的，因为图和表之间的对立徐灏这边曾被饶有趣味地加以思考。徐灏是董公振和沈莘田的表格最后增刻本的作者，正如我们所看到那样，该书出版于1870年。该刻本书名是《名法指掌图》，但徐灏认为，他们事实上并不是图而是表^⑪：

古人左图右史。凡史所难名状者，绘之图。而图有不能尽者，列之表。图者，所以助拟议之所不及也，表者，所以治错综之杂出也。是故探赜索隐莫如图，持简驭繁莫如表。图以佐史，而表以辅图。马班作史并重世表，陈范以下即不复能为之矣。

所以徐灏将图和表置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暗示着似乎图是一个非文本（虽然它可能包括“文字”，如同地图），而表纯粹是文字以一个特定的格式的重组。我倾向于把表（如下所述）作为图的一个子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图”这个术语涵盖所有种形式和手段，这无论如何都似乎已考虑到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大部份著作的编者使用通用术语“图”指称在徐灏看来实际上应称为“表”者。

乾隆中，吴兴沈稼叟先生撰名法指掌图，旁行邪上，排比系属，按其体例实表也。

并且徐灏继续进行法典组织与网之结构的经典对比，纲为条秩贯然之律，例则犹同系之于绳之目。事实上，我们同意并略加想象发挥，法网与表之间的类比不仅是功能上的，也是视觉上的：交错的行和列、在一页最上方的粗体的横排标题，岂不是网之纲目乎？

我们马上会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这里提及的表格（包括徐灏所出版的）的组织比我们所谓的“表”的组织都更为复杂。“表”通常由行和列表现，这确实在前二史以及其他各种体裁的史学存在：在方志和一统志中有行政建制沿革表、在一个特定地域担任过各种行政职位者的职官表，科举取得功名的科甲表亦见诸于当地志书，在被简称（这有点简单化，因为有很多其他事情）为“族谱”（书面语“族谱录”）者中有庞大的关于主支旁系之世系表。

但无论图或表，这样内容复杂、重复或两者兼具的表格设置，在所有情况中均受到一些因素制约并表现出一些共性。其目的始终在于按照一个连贯的整体原则将资料由于安排有序和简明而以一个比有线性形式的文本更具可读性和更方便的方式呈现出来，表格的要义恰在于其是两维的（所谓“纵横成图”），因此，在原则上，它存在两个入口。相比之下，在一个“正常”的文本形式中，只有一个可能的入口——开端，或更确切地说，（至少在正常的使用模式中）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即从出发点线性延伸，人们纵然选择途中的出发点亦概莫能外。

此外，制表并不是表现在一个线性文本中的最低限度的清晰度和层次唯一可以想象的方式。这样的文字可以通过使用各种印刷术做得更容易查找和利用，或更简单，通过使用图形（因为他们不依赖于印刷技术）显示提行、标题、等级、平行或其他重大关节。因此，它可以诉诸于段落、标题，或者通过其字体变化，或者甚至诉诸于各种标点和着重号，以显示其在文本中的定位。

当然，所有这些都存在于传统的中文版本之中。但有趣的是，这些技术在传统印刷的中国古籍是非常有用的，它通常是在针对平常读者、甚至商业性的效用出版物所采用：理想的

一个美丽的版本和一个美丽的布局仍然是在眼睛具有一个完美的连续性文本，每页栏栏充满，平缓流畅，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和不诉诸于段落^②。没有逻辑和句法的联结点、分节变化等等，这是读者自我去识别的文本、形式和节奏。

理想的布局拒绝任何技巧编排以使文本更容易理解。这不惟见于出版物，还见于行政文件，尤其是呈送皇帝的奏疏。但似乎特别不合理的、甚至令人厌烦的是，所涉及的文本纯粹是枚举，尤其是当其内容是不外乎相当于一个表的数字时。就以奏折而论，众所周知，清代皇帝每年收到各省民数谷数奏折，这些奏折被要求附以片单。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奏折表现为一个相当复杂的陈述，以符所谓的“四柱”——旧管、开除、新收、实在——的逻辑。这几乎属于表格呈现的范畴，至少应诉诸于线条以区分每一个新项目。但它却是由读者从文本中确定会计结构，唯一的连续性解决办法就是在提到的皇帝是直接受话人时另行抬格^③。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这在从官方出版物开始的刊行书籍中相当普遍。但是，在行政人员指南的情况下，尤其是那些实用的和具体的信息的提炼（与聚焦于伦理教化问题的书籍相反），我们可以称其为“实用工具”的介绍方式、标点符号和布局则在所多见，那些显然是源于商业性的出版物尤然。其并未标榜对表现计划“迥然不同”的特别主张^④。

“图”和“说”

表格在某种程度上的最终目的在于致力使内容尽可能切合实用和容易使用。这甚至适用于我们在此有兴趣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表格（当然序跋、凡例和目录例外）以及表格的内容和其他“凡例”。最常见的是，著作不包含除了被包含于表格本身者之外的“文本”，表格构成主体。该文本本身不是以一个“文本式的”（textuel）论述，它是资料的概要、最大化的简短，人们可以称其为电报体^⑤，它的含义不是来自于语法与修辞，而是在该表内文本片段的空间安排。因此，这种样式迥别于经典的表述公式。在这种公式中，“图表”（任何种类）将支持话语文本的完成

或澄清。表格式样与通常称为“图说”的相反结合不同。在这种结合中，文字用于评论有关其前面图片（图片和文字通常在中文对开页的正背面）^⑤。在我们的图书中只有一个真正以“图说”字样为标题（即王又槐《律例图说》），其没有“解释”涵义的说，只有图。

说，亦即文字，如果您希望保留这个词，就恰恰成为在表格中的资料。这样，其意味着原始文本（刑法典——如果这是简明的——或例，或任何其他）的转换，不仅在于其布局和印刷，也常常在于组织及其逻辑。人们如何这样保留了一些片断？这正是我在本节其余部分将要尝试说明的。

例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此，所有类型的图和表的共同的目的在于，以一种紧凑的形式呈现尽可能多的材料，并在同时明晰而容易速查^⑥。但视乎书籍和根据内容存在相当大的变化，其实是无限多的表述和组合，我不能举出很多例子。我已经选择了在行政人员管理领域，在此行政处分的规定配合刑法典律例（一些行为关涉私罪范畴）。

最简单的表现（意思是，制表对原文的形状影响最少）也许是《律表》。编纂者曾恒德在凡例中解释，他的目标是使律例内容瞭若指掌，通过组织段落、仔细的分行，也通过字体大小突出不同内容的相对重要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制表并不需要对文本本身加以干预。人们可以称其为说原来的材料零度的重组。

我们有一个更高层次的重组文本，但该操作不太复杂，因为有关内容极其简单，当涉及到把数字、税额或价格置于表格事，这在原来规定中可以是连续的文本，有时分散在几个条款之间，或在不同的时间制定的条款。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表 1 显示了在万维翰《律例图说》一个表的开始部分（“职官”门，第 13 A 页），这提供了最简单的信息类型：各省文武主要官吏衙门和京师之间距离里数，在更下一栏为传送文件的定限^⑦。资料应一栏接一栏，每栏标出衙门的名称和位置、距离和时限。应该指出的是，三行“至京”、（距离）

里、定限），可以节省各栏重复同样的话。尽管这一布局技术实际上是一个简单的名单处理，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法规后的补充，这也反映前一页最后一栏末尾“列后”一语。不过，这份名单较诸该更为正式的规定表现特别：它遵循于距离（和由此相随的定限）之递升，而不是在《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可见到的一成不变的省份层次^⑧。




图 1

在图 2 中，结构同样简单，摘取自《律例图说》同一门（第 8 a 页）。我们在那里看到表格头三行是有关新任（自家至任所）或晋升（自其前任职地到新任职地）官员的赴任限期^⑨。这仅仅标明了在 19 个省会中每一个与其他 18 个彼此之间的天数^⑩：这样，住在浙江分发到山西或为官于河南晋升到首都，知道他们自接奉任命之日起^⑪被准予多少时间驰驿到任，逾限将招致扣减俸禄和其他不便。因此，该表每一行表明，在上面登记该省份名称后随后以“至”一词，在中间登记其他省份名单，在下方登记到每个省获准驰驿赴任的天数。省份在中间登记的秩序似乎是为了使天数相同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其只出现一次^⑫。

在这样的例子中，地方（这是表格单一入口模式）和一个或多个数字存在对应。但大部分情况下，事情远为复杂得多。正如在《律例图说》中，我刚才提到的表格之后致力于对超过前表所列时限（“违限”）之制裁适应。从此表第一页（图 3）可以看出，作者如何试图呈现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局面。每一栏的顶部显示违限类型：（1）画凭违限，（2）领凭赴任违限，（3）在教职的特别情形中，文

| | | | | | | | | | |
|-----|-----|-----|-----|-----|-----|-----|-----|-----|-----|
| 順天至 | | | | | | | | | |
| 奉天 | 山東 | 山西 | 河南 | 江蘇 | 湖北 | 陝西 | 浙江 | 江西 | 湖南 |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 奉天至 | | | | | | | | | |
| 奉天 | 山東 | 山西 | 河南 | 江蘇 | 湖北 | 陝西 | 浙江 | 江西 | 湖南 |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 直隸至 | | | | | | | | | |
| 奉天 | 山東 | 山西 | 河南 | 江蘇 | 湖北 | 陝西 | 浙江 | 江西 | 湖南 |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三十日 |

图 2

凭直接在布政司领取，(4) 引见官员回任逾限，最后 (5) 奉差事竣复任迟延。在每一栏下叙明了制裁细节。

| 事竣 | 奉差 | 官員 | 引見 | 文憑 | 教職 | 限遠 | 任赴 | 領限 | 達免 | 達免 |
|------|----------|------|------|------|------|------|------|------|------|------|
| 復任遲延 | 回任逾限十日以上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照例處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3

举例来说，在类型 (2) 中，该栏按照有关的迟增长短分为两列显示制裁：如果不及一月，免议；如果是六个月，革职；介乎其间罚俸，或更严重的是调用与降级。该栏较低的一部分包含关于展限条件的一小段文字，但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诸如病倒途中，仍分别查驿文结不实。在类型 (3) 教职中，有两种时限及其逾限处罚：一种适用于布政使一旦收到部件就给发该当事人文凭，一种适用于该当事人赴任，如果晚了，该情形属于前面一般官员领凭赴任违限。在类型 (4) 和 (5) 存在同样的适用。最后，专栏 (4) - (5) 底部是预留凭限的一般性概念定义^④。此表继续在其他两个页面显示其他情形，提供关于程序、驿递任命文书时限和对于发生延误的纠参、在不同情况下逾限处罚等各种资料。在此无庸赘言。

| 圖 | 監 | 守 |
|-----|-----|-----|
| ... | ... | ... |

图 4

在另一种方式中，即当表格结合图 1 和图 2 所载相似的数字和非数码化的定性资料时，情况变得复杂。这里所示例的图 4 取自纽大炜《名法指掌新例增订》(1824 年)“六赃”门“监守盗”，我所讨论的是其中一表跨 2 个面对的半页面。这里不再是行政过错，而是根据刑法的罪罚。该表中有两个登记。上面

的登记构成如同一个表的入口，第一行的侵渔数字（银两数），第二行有关惩罚。同样继之列出了在刑法典题为“监守自盗仓库钱”（在Boulais神父翻译中为Inspecteurs et gardiens volant l'argent et le riz des greniers et des trésors publics)^③条款的文本，每一个数字附以相应的刑罚。第一行的第一空格转载在该条之头两句话（颠倒了原来的秩序）“并赃论罪”、“不分首从”。第二行的第一空格详注同样源自刑法典条款之官员免于在前臂刺““盗官钱（粮）”字样^④这一重要细节，因为这毕竟是官员手册。

较下面登记的是适用于本表数字的一系列定义，即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是被处罚的，因为他们所为符合当下所讨论刑法典条款的定义（“以”……论处）和因为如果存在这种行为而以同样方式被判刑，（“准”……论处）^⑤。这些定义不见于刑法典的注释中，很可能是源自“成案”。在此表中汇集的资料是取自各种来源，且较下面的部分颇为复杂。另一方面，对于用户的便利而言，这当然是较下面的部分具有极大的兴趣，因为它汇集了丰富的难以寻觅的资料，因为散见在繁浩的成案汇编，而上面部分的这些数字却是在任何刑法典手册都有的^⑥。

图5取自《《律例图说掌珍》》（与万维翰相竞争的著作，被后者谴责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剽窃），呈现出另一种类型的组织。这是奴仆试图以欺诈手段通过捐纳获得职官的情形，而在原则上他们的地位是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的^⑦。除了表格底部涉及家仆，即依附一个家庭的而可以恢复其自由的仆人，很简单地指出依据不应重律杖责八十，其余涉及一般奴仆，分为两栏，应该一个一个地阅读，所以是一个线性的方式。上方的第一列显示的定罪和处罚：适格对象是比照例不入选、隐匿公私、过名以图选用但尚未除授者，而处罚是发边卫充军^⑧。然后对以下人员有行政处罚（革去职衔、罚俸、降级）：（1）作弊候选人的互结候选各官^⑨，在此援引1735年的定例，（2）为候选人起文赴选之府县官员、给候选人具结作保的同乡京官，不行查明遽行出结申送者，最后（3）原籍总督和巡抚，在此负有管辖责

任^⑩。再次，该表有意思的是集合了来源不同的资料（刑事和行政），但针对的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图 5

在图6中所复制的表格和前例一样来自同一本书，关于服务至少满五年的吏员得选拔考试提升为佐杂官员——此项规定我们不知道是否是经常适用^⑪。该表格的组织方面复杂一些，但遵循的是相同原则：三个主要栏目，以便可能细分为不同类型的情况，应该被一个接一个地阅读。和以前的表格不同，这并不有关犯罪或欺诈，而是一个规定的解释、行为的违反和随之而来的制裁。因此，有（1）在开始时，框格被用于规则本身（吏员在什么情况

图 6

下有权获得这些好处、由巡抚评审可分为四类以及程序细节)；(2) 其次一些框格专门关于对那些已通过考试而使用各种形式的欺诈行为、或谎报他们的身份、或谎报他们服务时间者的杖刑处罚和徒刑处罚，因此这是属于刑事案件，每每通过比照以援引法律，(3) 最后，与前面的相联系，框格专门关于失于查察官员的行政处分。

为了加以比较，图 7 复制于“真”的《律例图说》，即万维翰的著作，针对于同一题目。可以看出，可以看出，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但框格里的引述略有不同，布局和印刷不太清楚。在某种程度上，模仿是比原来的文本更为成功的^①。

图 7

到目前为，没有图表可以被称为复式入口。不过，在图 8 中取自徐灏《名法指掌图》(1870)——换句话说，一系列上文所述肇端于 1734 年版本的殿军——的两个表格显示了这种情况。在此仅涉及律例，即在刑部的“人命”门。表格的右边涉及到官员，但这一次是作为受害者，因为这是一个“谋杀官吏”问题，行反映遂行的程度：已行未伤、已伤、已杀。列对应于杀人犯(或杀人犯们^③)和受害人的地位：所在官吏谋杀奉制命出使、部民谋杀府州县正印官、军士谋杀其本管官，吏卒谋杀本部五品以上长官。刑罚根据律例通过这两种标准得到，犯人之间也区别首从，并且在为从的情况下又区分：积极伸以援手企图加害

(加功)、不积极协助(不加功)和没有参与该行动(不行)——即不在场。你可以看到，在 2 - 4 列的第三行(已杀)中，最高刑罚——斩立决——适用于为首者和加功为从者。最后，末尾两栏的表格包括：(1) 凡吏卒或部民谋杀非本属、本管、本部的六品以下长官各依凡人谋杀论；(2) 谋死在京现任官员者导致斩立决。

图 8

将以直线方式介绍了相同资料的原法律文本和一个略有不同的重组表格进行比较，这是不无有趣的。原律云：

[谋杀制使及本管长官]。凡奉制命出使，而所在官吏谋杀，及部民谋杀本属知府、知州、知县，军士谋杀本管官，若吏卒谋杀本部五品以上长官，已行未伤者，首杖百，流二千里；已伤者，首绞；流绞俱不言者，则为从各减等，官吏谋杀监候，余皆决不待时，下斩同。已杀者，皆斩。其从而不加功与不行者，及谋杀六品以下长官，并府州县佐贰首领官，其非本属本管本部者，各依凡人谋杀论^④。

可以看出，在《名法指掌图》的表格中^⑦，文本在一些地方已被简化，但有些在小注^⑧的要素已得到澄清(精确指出刑罚而不只

是说“从各减等”)并分配至每个框格中;甚至一个特别栏目(第一)被用于澄清在一个小注简单地提到的事实,即所在官吏谋杀奉制命出使都规定处以斩、绞监候,而为(2)-(4)栏的主体的吏卒和部民是毫不拖延地执行(立决)^①。吏卒或部民谋杀非本属本部的六品以下长官的情形是在该法末尾以小注提及的,在表中被放置在专门一栏。最后,我对最后一栏谋杀在京现任官员的原文出处尚不得而知。

在图8其余的表格也可以类似地加以评论,该部分涉及谋杀尊长,和紧接着律例谋杀制使及本管长官之后的条款相对应^②。此表格显示了前一表格相同的结构,但组合更为复杂一些,因为其区分杀人犯与受害者相关的服等、姻亲问题,以及奴婢雇工人谋杀家长戚亲的特殊情形。原来的法律文本(比在先前的长,我在这里不予引述)同样已被压缩和分配于表格中。一些元素借自于条例,例如在倒数第二栏“旁人”同谋助逆加功、或者在最后一栏谋杀共犯参与程度等问题^③。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为了明晰起见,法律第二部分,其涉及相反的情况谋杀卑幼,已被从表中置之度外^④:因此其是在另外一个题为“谋杀卑幼”的表格中加以处理。

在我所列举的各种不同著作中选择在内容和表格形式多种多样的例子加以说明,这可以继续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在我看来,以上的几个例子应足以看出已经提及的一些特征:结合刑法典、处分则例甚至司法“成案”等异质来源规范于精心设计和组织的同一空间之内;再者努力以图表展示原因和结果(刑事违反和制裁)链条中纷繁复杂(尤其是在处分则例所覆盖领域)的所有情景。最后,旨在使最大可能数量之律例材料浓缩于书中而易于翻检。

最后,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书籍从十

八世纪才开始出现并继续蓬勃发展直到下一个世纪?我只能很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无论是具有注释的刑法典,还是条例(变为真实的增律始自1740年《大清律例》),还是行政处分规则,都不是发明于清朝。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雍正在统治期间(1722—1735)努力整饬官箴和使帝国的行政秩序并然是众所周知的,标志着增加的规定制度集中化和系统化过程的开始。这个一直持续到王朝末年的过程和其中为直接后果的急剧繁殖的文本,不只反映了制定“法律”以加强王朝权力而延伸至于中央对于官员工作最小细节的控制。它主要是源于十八世纪初叶几十年中国的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管理总量史无前例,控制和规范的问题大幅增加。

人们经常说,公职人员的数量在帝国末期并没有随之增长,因此中国由国家直接出面的管理越来越少,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由诸如行会或宗族等私人机构分揽合同越来越多^⑤。我深信并没有真正的减少。在国家机器职位数目的“正印官”仍或多或少保持恒定固然属实,但可支配的行政工作力量在省级政府以候补官员(见习人员)的形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尤然,而更多的数量的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士在地方行政官员幕府中充当幕友,并由这些官员付费,也就是说,由平民百姓付费。正是由于他们,国家一直能够保持活力,并在事实上增加其在社会性规制领域的抱负,尤其是在法律领域。增长的法规和定例被错误地认为与现实割裂开来和仅仅有利于吏役玩法舞弊的一种现象,而最直接和呈几何数增长的官箴书和地方官员使用的工具与此同时显然是齐头并进的。立法表格仅仅反映了文学作品有限的一小部分。不过,对其研究似乎是很有趣的,因为,它是如前所述的发展直接引起的,其成功似乎已经很可观,但迄今不为人们所关注。

译者进行了讨论。

②此文章是基于在研讨会“从形象行动:动态视觉表象,在中国思想文化和宗教中”(De l'image à l'action: la dynamique des représentations visuelles dans la culture intellectuelle et religieuse de la Chine)上提交的论

①此稿原请精于法文的方家进行翻译,但由于各种原因未果,由于国内既熟悉法律和历史又通晓法文的学者几乎阙如,故译者不得不勉竭驽钝,以承其乏。在译事完竣之后,本文作者魏丕信教授又历时两月逐字逐句审阅修改了译稿,并在北京从事研究期间专门与

文，该会在“东亚研究中的欧洲和北美交流”框架内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Exchanges in East Asian Studies) 于 2001 年 9 月 3–5 日在法兰西学院举办。我要感谢巩涛 (Jérôme Bourgon) 关于法律上诸多之处的建议。

③据康斯坦先生提供的资料，幕友原英译成 “private secretary”，后来法语由英译文直译成 “secrétaire privé” 故称之法式英语。译者注。

④因此，可以肯定是吴士映在《律例图说》序言 (1763) 云，这将无疑是“为居官入幕之要览。”

⑤其作者几乎都是幕友本身：董公振是《钱谷刑名便览》的作者，而沈莘田是《名法指掌》的作者 (参见下面)，其可以被视为 (并似乎已被视为) 这类著作的创始人。顺便指出，我们注意到，其他作者，有时是指由各自的儿子，南厚和耕于。

⑥另一版相同的“堂”——诚意堂在扉页标有“1737 年增订”。但 1742 年的另一个题作《增补钱谷刑名便览》，并揭橥自己作为“新刻版”，它其实在第二卷有九个补表。

⑦关于大清律在形式的这个变化而由此直到晚清对法律思想和实践产生的深刻影响，参见巩涛：《在帝国末期民间讼师的出现》 (Jérôme Bourgon “L'émergence d'une communauté de juristes à la fin de l'empire”), 在 2003 年 3 月 26 日法国学院提交的论文。

⑧该修订版的凡例声称新颁行的《大清律例》之后的增例亦于 1743 年夏天被汇集于表格。

⑨公元 6 世纪，查士丁尼大帝对大部分罗马法进行重新整理汇总，编纂成一部有四部分构成的《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 又译作《国法大全》)。本文作者在此使用 Corpus 一词，即具有比附联类的意味。译者注。

⑩这指的是 1725 年版的《大清律集解》。

⑪我所看到的一些《钱谷刑名便览》的样本包括插入的额外的页面，标注以“又”，引述 1734 年后之例。

⑫事实上，这本书有时被以《钱谷刑名处分便览》的标题被提到。参见《增订刑钱指掌》(1744, 下文讲谈及)，凡例第二段。

⑬参见徐灏《名法指掌图》(标注年份为 1869 年) 序言。徐灏在这里反对原始版本的《名法指掌》(他称为名法指掌图) 将这两个类别分开，所评论的同一本书出版于 1820 年，在那里被合二为一。事实上，图表内容的简单检视可见，在现实中的东西并非如此旗帜鲜明：赓续的编辑曾多次重新整理材料，以期其显得对于用户最切实际。

⑭见沈莘田《增订名法指掌》所附“便览”的跋。那个从事此工作的书肆想必是同德堂，可断定这是

广西的省会桂林。

⑮无论是一个标题的前缀“增订”(“augmenté et révisé”)还是在日期之前标明新镌 (“nouvelle gravure”), 不一定意味着有同一本书的前面一版，或如果有这样的书，则“新版本”(“nouvelle édition”)不外乎是同一刻板简单重印而已：这些格套之词往往是用作为广告的论据。

⑯《名法指掌增订》原序 (1740) 和补注 (1743)。

⑰台湾中央图书馆有一个标明 1745 年杭州名为有文堂书肆出版的《名法指掌增订》，我还没有见到。

⑱至少在标题页的完整的标题加上“新例”字样。

⑲肇端何时，我无法断定，但无论如何，在整个十九世纪，新任命的法官由吏部公开掣签选分发各省，不是如同最初那样指派一个特别的地方 (参见拙著《创立、冲突和常规：官员掣签任命，1594–1700 年》(Creation, Conflict and Routinization: The Appointment of Officials by Drawing Lots 1594–1700), 《明清研究》，2003 年，在出版中)。这些“见习官员”构成了省级政府可资利用的相当大的行政工作力量并可能被分配以各种急需任务。

⑳销售地一目了然，这是相当罕见的：在标题页标明“粤东刊版远安堂发兑”。

㉑国会图书馆法律部 (Law Library) 却有另外一个版本 (2 份!), 几乎相同，但无刊刻日期，显然来自不同的刻板，或至少有所改变，尤其是在其版式。我还看到了另外两个版本，一个是在北京的书肆荣陞堂，注明日期 1833 年，和 1907 年广本，似乎事实上所有其他的版本相同。

㉒也有注明时间为 1866 年版本，明然是一致的。

㉓黄鲁溪在他的前言简单地将邵作为“老乡”提及，他的原籍是吴县，邵则是常熟。两者均属苏州。事实上，他受雇作为幕友在《读法存疑》前言得以证实 (见下文)。

㉔他在 1840 年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其仕宦生涯遂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㉕也许这些来自 1846 年版本，我曾见过包括直到 1850 年的更新的一部。

㉖关于这些半官方书局的和他们制作的版本 (称为局本)，见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4 年，第 359–367 (即原来的版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以及王钟翰：《北京厂寺访书记》，见于：《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7–306 页，注 301。

㉗徐灏修订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1900 年在北京由荣禄堂出版。

㉘除了下面所陈述的总结律例和则例的表格汇编外，

我们还知道万维翰著有：《纂学举要》（编纂于 1740 年，出版与作者题跋日期为 1770 年）、《荒政琐言》（1752）、《行简录》（1770）、《刑钱指南》（1773）、《成规拾遗》（1773）、《大清律集注》。与此同时，王又槐出版了《办案要略》、《刑钱必览》（1793）、《钱谷备要》（1793）和构成在整个十九世纪众多同类出版物的基础的《洗冤录集证》（1796）。

②9 在国会图书馆法律部也保存有几个其他的版本。

③0 其中一个版本（属于在北京田涛先生的收藏）在书名页的戳记显示：是集万氏家藏。原本随时增减。

③1 不过，显然只有处分则例的规定的选录被列入，律例的文本付诸阙如，但这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材料汇编。

③2 “比类叙之，不以律为次第也”（1750 年版本凡例）。同类的一些表已被排比重组以资参定。

③3 凡例言：实简而赅非略。

③4 珍掌，意味“珠宝在手心”（*joyau dans la paume*），系指“爱之人（特别是儿童）”。

③5 几年前我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到过，但它似乎此后已遗失了。

③6 这也是与书肆出售的题作《律例图说正编》图书几个版本的赅本的区别所在。参见沈翼《律例图说正编序》（1774）。就其本身而言，《律例图说正编》的凡例在开篇就回顾指出，原型可追溯到董公振之书，还声称该刊刻将现有的类似过时著作摈弃一边乃理所当然，其中他提到的，正是万维翰的《律例图说》。

③7 篇幅大体近似（10 分册），同样按六个领域（或称“六部”）组织表格，同样结合取自大清律例和处分则例的规定。主要的区别也许在于万维翰的汇编的省例取向：除适用于整个帝国的法律外，他介绍了适用于福建省的省例。

③8 我见过的只是最后两个版本，但在石中隐 1790 年所写的序言中叙述了此前版本的历史。

③9 *Alter ego* 拉丁语中即“好朋友”，法语中即“第二自我”。译者注。

④0 我目前不能详论所有图书馆各种目录所登录的 5 个（或者也许 6 个）不同版本。在我所见者中，一个未注明日期，可能是第一版，前言说明刑法典在 1772 年和 1778 年分别颁行的增律已经被纳入。另一种袖珍版（题作《袖珍律表》）有两个版本，由北京两个不同的书肆出版：金东书行（注明时间为丙子，1816 年抑或 1876 年）和承裕堂（无日期），两者均有 1791 年序，并将 1778 年和 1788 年间颁行的增律纳入而单独成册。相同的内容可见于贵州省 1883 年大开版印刷的同一版本。

④1 最后两卷其实是《督捕则例》的内容，《督捕则例》本身不是刑法典的一部分，在该书的袖珍版，他

们是被附带计入（刑法典文本本身 36 卷）并单独成册。

④2 该补册标题是《洗冤录表》。王又槐的《律例图说》甚至包括总结《洗冤录》的数表。自《洗冤录》1694 年官方校勘本颁布，该书或多或少被视为刑法典附录，往往与各所刊之书联在一起印刷。

④3 众所周知，在中央政府没有幕友。无数的文献中均认为，专业知识一直垄断在各部承办人员手中（即吏，一些作者在 19 世纪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帝国真正的主人），但就刑部而言，在刑部工作的官员往往是非常能干的律学名家，这至少昭然若揭的。

④4 我在《中国帝制时代晚期如何学习为官之道》（*L'apprentissage du métier de fonctionnaire à la fin de la période impériale*）举了一些例子，该文收入克里斯蒂·阮智（Christine Nguyen Tri）和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主编：《教育和培训在中国》（*Education et instruction en Chine*），卷 2 巴黎、鲁汶：皮特斯出版社（*éditions Peeters*），2003 第 7–47 页。

④5 我在这里不能对这些“韵言”（《读律歌》、《读律一得歌》、《律例歌诀》、《读律瑄朗》等）加以展开论述（标题一目了然）。提高效率与否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时论中云，其中一些还提供给诉讼百姓，以图提高对其行为后果的认识。这仅仅是地方官本身的一厢情愿。

④6 开始为幕友而后设法进入仕途者。典型的例子是汪辉祖（1731–1807 年），参见《帝国晚期为官技术的学习》，载克里斯蒂·阮智和戴思博主编：《教育和培训在中国》。

④7 参见《名法指掌》原序（1740 年），其说的是地方官有众多的案件有待处理：“服官者环庭剖决，于斯须司幕者濡笔权衡于旦夜”。

④8 若干作者指出，他们所提供的表格不包含刑法典的所有内容及其疏议，如果司法判决中要正确援引，必须毫不犹豫地检视刑法典全文。因此，《名法指掌增订》（1743 年）凡例第一条云：“图说原取简便，定案时易于引证，若律例自有全书，故不连牒繁引”。纽大炜 1824 年所纂《名法指掌新例增订》凡例更是声明，这本书仅供作引线，执意吁请读者“勿据此，以为定，致有漏，致有舛也”。

④9 *Diagram, Chart Figure* 这些概念在法语和英语中的区别由于文化背景的缘故往往不为中国人所明辨。据译者所见，*table* 是比本文所说的 *list*（清单）稍微复杂一些的表格，基本上是一种统计表格，而 *Figure* 本意为数字，也可以指立体的塑像之类，所以在西方学术著作中是指将统计表格数据用座标系转换成的二维或三位的曲线图和柱状图（*bar chart*）。至于 *Diagram* 概念中一个关键要素在与其理念的表示，故而米歇

尔·安德森 (Michael Anderson) (1997) 指出: diagrams 是图形的、但抽象的信息表示 (pictorial yet abstract representations of information)。易言之, Figure 是从数据出发, 而 diagrams 则主要是从理念出发, 表示简图、图解、示意图, 诸如树图 (tree diagram)、网络图 (network diagram)、流程图 (flow chart) 即是其例。译者注。

②两相对照, 前面所讨论的王又槐《律例图说》或铁珊《刑名图说》, 与巩涛所描述的《刑律图说》《罪名图说》的标题极为相近, 后两个的图是刑法典所规定的流刑图表, 说明了语义的腾挪转圜。见巩涛《中国的处决人犯: 其与欧洲酷刑区别的可视化》(J. Bourgon, “Chinese executions: visualizing their differences with European suppliants”), 《欧洲东亚研究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II/1 (2003), p. 151–182。

③徐灏:《名法指掌图》, 序言 (1869)。我在翻译“图”一词时在“cartes”和“planches”之间颇费踌躇, 但在历史写作语境中的, “cartes”似乎更令人满意。司马迁、班固分别是《史记》和《汉书》的作者, 范晔和陈寿则分别是《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作者。

④例外的是, 在官方文本中提及皇帝和执政王朝时诉诸于另行抬格。

⑤在魏丕信和王国斌《字养生民: 1650–1850年中国社仓制度》中, 我对这些奏折提出了详细的格式分析。魏丕信、王国斌:《字养生民: 1650–1850年中国社仓制度》(P. – E. Will et R. Bin Wong, 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 1650–1850) 安娜堡: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1991年, 第8章。

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书在文本上并非精审的。从这个角度讲, 最引人注目的制作可能是《洗冤录集证》的一些版本 (正如我如上所述, 其最初由王又槐纂辑) 在整个十九世纪均有刊行: 划分段落清楚, 每页预留给某些类型的评论的地方, 标点符号丰富和使用若干不同颜色油墨来区分不同阶层的评论……

⑦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承认, 刑法典极端简洁和已经条目整饬的特殊风格, 本身特别有助于这种类型的呈现。

⑧主要的例外是我所引述的第一本书: 董公振《钱谷刑名便览》, 该书表格大多在所引用非简化成例、甚至“成案”(“cas homologués”)之后。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 这是“评论”说明表格而非相反。这种类型的呈现此后实际上杳然消失了。

⑨顺便提醒, 速度查阅不仅取决于表格的形式, 也源于主题的逻辑重组、表格内容的准确、参见互文 (如

果存在) 甚至在版口中央镌刻的题目, 这可以使我們很容易地翻阅查找到我们所寻求的内容。

⑩这是在由部咨文行查参奏官员在履行职责逾限回覆程序 (见下文)。表格标题在版口, 第13页, 题作: 咨文到京程途限期。

⑪按照清制, 这个层次当然始于直隶, 其次是王朝在满洲的龙兴之地 (盛京)、江南、华北各省、东南、长江中游和四川、南方和西南。在图1中, 依据距离增加, 从北京到直隶首府 (保定, 向南180公里, 衙门设在同一省北部边缘)、山东、山西、河南等等。不一定按照直省划分, 甚至在此后的页面到云南最偏远部分的衙门。

⑫《在籍候选及在外推升赴任限期》。在版口的标题略有不同:《在籍领凭在外推升限期》。

⑬有一个小的不符合常规: 在直隶, 几乎总是顺天 (北京) 被标注, 而非省会保定。

⑭更准确地说从启程之日起算, 因为在他们被正式通知和他们必须启程之间, 他们被准许有一个时期 (新任一个月、晋升十天)。

⑮人们可能推想时限总是从低到高按序排列 (如同在表1第一行和第三行), 但这远非如此。

⑯同样, 栏(1)底部标注一些当雇员达到旅途目的地向直省当局缴凭和文凭污损、破损或丢失问题的一般性的资料。

⑰薛允升:《读例存疑》(1905年), 台北: 中文研究资料中心, 1970年, 卷三, 第577页以下。(律264/00)。这是包括在大清律例刑部贼盗门的条款。

⑱明朝朱元璋严刑峻法惩贪, 所以明律对于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的贪污行为规定“并赃论罪”, 并于犯官右小臂刺“盗官钱 (粮)”字样, 耻辱终身, 而清律则以恤官体之故令官员免于刺字, 殆两朝法律存在不同, 此亦或许是本文论及表格加以提示的另一用意。译者注。

⑲至于这些推理和“八字”, 见于巩涛:《司法案例的效力: 在中华帝国法律中定例的功能和性质》(Jéôme Bourgon “Les vertus juridiques de l'exemple: nature et fonction de la mise en exemple dans le droit de la Chine impériale”), “遠東 – 遠西”(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9 (1997), 页7–41, 尤其是从20页起。

⑳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律之例有八: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翁元圻注:“《律疏》‘以’者, 与真犯同; ‘准’者, 与真犯有间; ‘皆’者, 不分首从, 一等科罪; ‘各’者, 彼此各同科此罪; ‘其’者, 变于先意; ‘及’者, 事情连结; ‘即’者, 意尽而复明; ‘若’者, 文虽殊而会上意。”翁注此处所谓《律疏》, 是指《唐律疏议》

一书。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三引《护德瓶斋涉笔》说：“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相传谓之律母。”《歧路灯》第七十九回：“总缘‘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的学问，与‘之乎者也，耳矣焉哉’的学问是两不相能的。”这是以法律条文中最基本语汇借代指称律学的专业性。由于此八字在律文中常见，而且意关紧要，雍正朝《大清律集解》律首即列有“律分八字之义”、“六赃图”、“五服图”、“狱具图”、“丧服图”等。译者注。

⑨ 《《律例图说掌珍》，吏，第12页，奴仆捐纳

⑩ 该比照可能是基于“成案”或皇帝圣旨已确立的一个定例。该表引述的文本是一项很长的法律规定的片言只语，该原文有关官吏被处罚或者撤职而无权捐纳者，然而却通过各种途径极力隐瞒其情况并已获得选任。参见《读例存疑》，第2卷，第194页（增律053/01）；布莱斯：《中国刑法典手册》（Guy Boulaïs Manuel du Code chinois），第122页，其中所引为文本摘要。需要指出的是，表格中的罚则（“发边卫充军”）含糊不清，而律文中言，对于那些“尚未除授者”（在此所讨论的）是“附近充军”，与对于那些已经除授委任者之“近边充军”相对称。

⑪ 任何候选人均应提交5名来自同省官员签署的一份保证。

⑫ 注意的是，刑事处罚可能适用于这些相同的官员被查实的腐败案件中，这就是说，他们收受贿赂而包庇欺诈行为，但这在表中未加呈现。

⑬ 《律例图说掌珍》，吏，第13页，吏员考职。

⑭ 《律例图说》，同上，第54a页。然而，应当指出，原来的文本（表7）在更广泛的框架概述了程序，不局限于在复制文本中所体现的窠臼（每月七月应为每年七日）。

⑮ 据疏议云，谋杀之因，必起于二人，在法律文本，

其中的区别在于首或造意、从或为从。见沈之奇：《大清律例集注》（1715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二卷。

⑯ 薛允升：《读例存疑》，卷4，第789页（第283/00条）。

⑰ 或者该书其他版本，尽管在图表信息提供上有一些变化，但对此并无大碍。

⑱ 这些在清初已被纳入（颇多沿袭明朝的）法律文本，但在印刷上仍然是区分的。

⑲ 大量的“监候”死刑判决在“复核”、即皇帝主持的秋审之后才被最后定讞。

⑳ 这条法律的确切名称是“谋杀祖父母父母”：参见《读例存疑》，卷4，第780-781页（第284/00条），和布莱斯《中国刑法典手册》（Guy Boulaïs Manuel du Code chinois），第544页（“Parricide prémédité”）。谋杀尊亲较诸谋杀官使更加在道义上被受谴责：这是“十恶”之四，被称为“恶逆”（布莱斯译为：detestable subversion）。这也解释了为何在这里的最高刑罚是可以设想的最坏结果——凌迟。

㉑ 这些纂入在谋杀官使表格中不得其见，因为该律没有附例。

㉒ 该律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家庭年轻成员谋杀祖父母或父母，第三部分是专门针对于奴婢和雇工人谋杀家长期亲。

㉓ 以上经典的参考是施坚雅：《导论：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George William Skinner “Int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见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尤其是第19-23页。施坚雅将其推理建立在府属行政（县级单位）单位数量之上。在整个帝国历史中，这确实仍是大致相当，在时甚至减少。